

大学流行音乐通识教育中 “家国认同”的构建策略

段斌,胡红梅

(湖南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

摘要:流行音乐正式登上中国历史舞台以来,其作为一种大众文化形式,百余年来在普罗大众的精神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也参与了青年人的人格塑造与价值观形成过程。伴随消费主义思潮成长起来的当代大学生群体,很容易被当下眼花缭乱的媒体和传播手段裹挟而呈现“认同”危机。通过梳理中国流行音乐中的“家国叙事”,分析大学生“家国认同”危机的表现形式,提出了在大学通识教育中通过加入流行音乐教育这一环节,更加涵育青年学子的“家国情怀”,构建“家国认同”的策略。

关键词:流行音乐;通识教育;家国认同;构建策略

中图分类号:G2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22)01-0151-06

从黎锦晖的系列创作标示中国流行音乐正式登上舞台开始,中国流行音乐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受到多种社会力量左右,经历了多种风格的嬗变。在价值观念上,它作为一种大众文化的表现形式,一方面的确承载了社会民众的价值观,另一方面与主流价值观念的关系又处于变化之中,因而在不同历史时期引发了不同的解读。综而观之,流行音乐在抒发个人情感的主基调之外,“家国叙事”的词曲创作也构成了其中的重要方面,并且在烘托主题和家国认同方面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1 中国流行音乐的“家国叙事”

长久以来,中国的流行音乐在发展中本身就内含着“家国叙事”,无论中国流行音乐发展中的“私情”与“家国”如何交织共进,流行音乐中的“家国”元素仍然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家国一体”的文化影响。1895年,康有为上书在“新式学堂”中开设“歌乐课”开始,推动了区别于旧

式音乐类型的现代中国“新音乐”发端。“学堂乐歌”在这一时期探索将外来音乐通过改造的形式,自觉嵌入了中国民族觉醒的过程,呈现了一种鲜明的文化态度,如这一时期创作的《男儿第一志气高》《扬子江》等歌曲,第一次正式出现了“一操再操日日操/操到身体好/将来打仗立功劳/男儿志气高……”等。李叔同借助美国通俗歌曲作家奥德威《梦见家和母亲》曲调填词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则融进了独特的中华气韵。被誉为黎锦晖填词作曲的“中国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小亲亲不要你的金/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则呈现了男女情爱的基调。纵观流行音乐的发展史,就价值观念而言,流行音乐所承载的普罗大众情感表达,更多则是在“情”与“爱”的盟誓中荡气回肠,比如随后“十里洋场”的《天涯歌女》中“小妹妹唱歌郎奏琴/郎呀咱们俩是一条心……”等歌曲以情爱为主题,在迅速动荡的岁月中抚慰了一代人的心灵。

收稿日期:2021-10-21

基金项目:湖南省社科评审委员会一般项目(XSPYBZC024)(湘社评[2016]12号)

作者简介:段斌(1973—),男,湖南湘潭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研究、文化研究。

对于中国文化在近代发展的进路,正如列文森所言:“中国近代思想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可以说是一个使‘天下’变为‘国家’的过程。”^[1]而国家秩序中对“家国”的规定性,始终体现在各个方面。即便是近代以来中国遭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种种冲击,“家”与“国”仍然互为表里,共同维持了中国传统文化内部的稳定。而在由一系列看似巧合的历史事件发生之后,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丛林。在异邦的侵辱下,原来“自上而下”的帝国治理模式逐渐演变为现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观念下“自下而上”重新思考、探索“国”的“图存救亡”过程。流行音乐也参与到这个历史进程,出现了革命时期的《十送红军》《东方红》《团结就是力量》《我的祖国》等歌曲,和建设时期的《南泥湾》《咱们工人有力量》等广为传唱的流行歌曲。

改革开放以来,当代文化生态出现了巨大的变化。特别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由改革开放带来的生活水平提高和精神生活进一步丰富,普罗大众的精神文化生活开始迈向多元化。其表现之一是,主流的文化形态受到欧美文化的冲击,自身的价值内涵和表现形式开始调整。多元化的另一表现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流行音乐经历了一个较为曲折的发展过程。

从曾被视为“靡靡之音”的邓丽君歌曲肇始,当代流行音乐在中国经历了一个较为复杂的变化与接受过程。1984年在春节联欢晚会张明敏用《我的中国心》“河山只在我梦里/祖国已多年未亲近……改变不了我的中国心”接过了国家层面对流行音乐认可的一棒,也在大众文化中开启了新时期“家国叙事”新的历史表征手法。从发展进路看,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发展,其曲调、曲式、歌词和传播途径历经了从“模仿港台”“民歌采风”“西式摇滚”到“新校园民谣”等的发展过程,同时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着普罗大众心理轨迹的变化,其词曲创作曾一度被视为“下不完的雨,忆不完的故乡,诉不完的离别,吐不完的思念……不是‘吻’就是‘爱’的歌曲,大多只抒发了一些自我叹息的情感,僵化在一种自我的个人小天地中,……从中找不到民族精神,找不到时代情绪,也找不到多彩多姿的世界。”^[2]由此可见,与同时期主流价值塑造期待的差异性,流行音乐招致了“小”不见“大”批评,一度被视为“过度自由化”。而本土化的“信天游”家乡叙说与以《龙的传人》为代

表的“巨龙巨龙你擦亮眼/永永远远地擦亮眼”,国家觉醒逐渐奏响了时代强音。

当前,在以互联网技术发展为主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冲击下,全球范围内的不同价值观的交锋更为激烈,国内的文化语境也正发生着价值观重塑和思想认识调整,这就对民众的精神力量进一步重整与振奋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突出的社会性、宣传性功能的音乐(包括高雅音乐与流行音乐)必将发挥重大作用,也更需要在流行音乐这个“舶来之物”中加入更多的中国元素,使之更好地承载主流价值观念。毕竟“古代中国,乃是一个家国天下连续体。个人的行动和生活的意义,只有置于这样的框架之中才能得到理解并获得价值的正当性”^[3]。

在中国的文化长河中,我国古代的音乐教育具有“诗”“乐”一体的特征,注重“文以载道”,同时也注重音乐的教化功能,如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就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之说,“乐”之载道,使人既可为君子,又能“兼济天下”,这也是中国独特的乐教传统。即使在当代,我们也不难发现,家国观念的文化机制正呈现高效运转的状态。“中央电视台一年一度的春节联欢晚会所营造的媒介场正是为大众预设一种大‘家’的幻象,确立‘我们是谁’‘归属于谁’的身份感,人们在这种‘家’的附属中,安全地沉湎于一种‘家’的整体性和完整性中,体验到‘在家’”的感觉”^[4]。比如在《2021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歌曲节目单中,依然有《明天会更好》《灯火里的中国》,以“灯火里的中国/青春婀娜/灯火里的中国/胸怀辽阔/灯火漫卷的万里山河/初心换回了百年承诺……”等流行歌曲参与了这一建构过程。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当代中国流行音乐的“家国叙事”也在探索用新的方式联结构造“家国”的宏大命题。它一方面注重发掘自身的审美价值,同时也更加注重具有社会功能的“民族精神”与“意识形态”的建构与培育。其趋向表现为在尽力弱化个体的同时,寻求以“共情”的方式在宏大叙事中探索持续加强精神统一的方向。

我们也应该看到,相较于其他类型的流行音乐,在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流行音乐创作与普及中,“理想化”与“大众接受”有着不小的差距。基于特定的历史条件,除音乐旋律外,爱国主义歌

曲中所包含的“家国叙事”主要源于政治的支持、护佑与推广,其音乐表现体裁大多单一而稳定。而大学生群体的思想观念中所包含的个性化、随意性以及不稳定因素,与主流价值观所具备的主导性、教化性与严肃性已经明显地区别开来。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因此,在多元化的文化语境中,探索在流行音乐这种大众文化的形式中,如何呈现与渗透主流价值观的铺陈,成了当下紧迫的问题。

2 当代大学生“家国认同”危机

由于重视对现代传播手段的应用与驾驭,流行音乐通过现代传媒的大量生产、复制和传播,契合了大众的文化心理和欣赏趣味,在受众的思想与现实生活中产生着广泛影响。“全球化在技术—经济层面以无限发展为目标,趋向于整体化;在文化—精神层面,其根本意义是消解地域内涵和本质属性。这就必然造成弱势民族在面对强势文化冲击时产生的自我认同的危机。”^[5]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文化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在文化工业与文化资本的掩映下,新兴传媒的全面覆盖能力和传播技术手段的巨大投射能力开始渗透成年人和青少年生活的方方面面。青年群体特别是大学生群体思维活跃、可塑性极强,最容易接受新的事物和观念。极具感染力和传播性的流行音乐在青年的日常学习生活中长驱直入,极易影响伴随消费主义思潮成长起来的“90后”“00后”,并悄然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甚至人生选择。因此,面对纷繁芜杂、良莠不齐的文化类型,甚至异质意识形态,他们更容易产生文化叛逆,从而形成“家国认同”危机。

一是民族文化认同感淡漠。民族文化及其认同是家国认同的基础以及维系民族和国家的重要纽带,也是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文化意义上的民族身份,构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和行为规范”^[6]。在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竞争中,没有什么比文化认同的失去更可怕。当中国的经济建设成为全社会的中心之后,思想价值观念也发生着深重的变化是个不争的事实。其结果是旧的不合时宜的文化价值观崩溃了,新的社会主义文化体系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以至于几乎所有的社会成员处于无序状态之中,信仰、信念产生了危机。同样,大学生群体的精神也受到了严峻考验。

多种类型、形态且潜藏多种价值观的流行音乐,正悄然改变着他们的思维方式、欣赏趣味、价值观念和文化心理。在全球化冲击下,部分大学生对中国民族精神的理解也出现了偏差,或者说他们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开始淡漠。对于我国而言,能够繁荣、和谐发展的前提就是要先对自身的文化产生认同感。人类学家詹姆斯·克利福特曾指出:“文化,一个集体的想象,是个体自身和自由的土壤。”^[7]因此,以合适的方式强化大学生的民族文化身份认同,是一个关系国家力量强大的根本性问题。

二是对“家国”认同度较低。流行音乐自南向北的流行过程,解放了一度被禁锢的个人情感世界,从而赢得广大受众的心灵。就此而言,它的确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也使大学生群体更加关注个体的“心灵体验”。但是,全球化语境中西方文化的强势影响、社会达尔文主义、当代中国发展变化带来的震荡、网络虚拟世界的是非难清等等,直接导致部分大学生产生了无所适从的生存焦虑。虽然他们可选择更为多元化的方式寻求自我,却对“报国”这等字眼逐渐生疏,集体主义的理想信念进一步淡化。一部分人理想色彩黯淡,对自己的定位很模糊,顾眼前而不顾将来,走一步看一步。另外,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对以“家”为中心的传统文化观念存在抵触情绪,沉浸在以互联网构造出来的虚拟世界里,表现出新的“社恐”和疏离传统家庭伦理的状态。这就使得家国、理想、信念不再是认同的最终落脚点,不再具有最高的合法性,取而代之的是片面追求个体、个性的发展。这样的趋势,则进一步加剧了“家”与“国”的认同失范危机。

三是对主流意识形态抗拒。主流价值观的音乐实践,一般通过灌输、感染、宣传与引导作为塑造主流话语权的方式,这在近年来亦遭遇不小的挑战。在当代,流行歌曲已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对大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它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大学生作为流行产品的主要消费者,更不可避免受到流行歌曲的影响。尤其是伴随消费主义思潮成长起来的青年大学生群体,其思维和心理还处于发展阶段,更加容易被当下流行音乐令人眼花缭乱的媒介载体和传播手段所裹挟,产生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虽然多数大学

生对“国家”“民族”等主流意识形态表示认同,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群体对“新”“奇”的舶来潮流文化所包含的异质内容,甚至对霸权意识形态缺乏辨识能力,容易在“醉生梦死”的感官体验中逐渐产生价值扭曲,在无形中形成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抵拒心理。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曾指出:“优秀作品并不拘于一格、不形于一态、不定于一尊,既要有阳春白雪、也要有下里巴人,既要顶天立地、也要铺天盖地。只要有正能量、有感染力,能够温润心灵、启迪心智,传得开、留得下,为人民群众所喜爱,这就是优秀作品。”^[8]作为“下里巴人”且“铺天盖地”的健康向上的流行音乐,其“化育”功能理应被重视。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角度看,在现代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体系,也更加需要流行音乐教育。

3 认同建构策略

音乐教育的本质是审美教育。如何在流行音乐教育中提升学生的审美能力,将通识课程的专业素养与人文素养结合起来呢?这必然需要在合理的目标预设下,从价值导向梳理,也就是要从“培养什么样的人”出发,对一系列理论、理念、途径等方面来创新课程体系。音乐审美教育中引入流行音乐,在挖掘审美意蕴的同时,应一方面充分尊重大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在大学通识教育中融入流行音乐教育,以“梳”与“导”引导学生识别和摒弃陈旧的、落后的、低俗的内容,确保在大学生身心健康发展上发挥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音乐教育中加入流行音乐教育的权重,既可以帮助学生理清纷繁复杂的流行音乐类型的发生发展过程,而且以“家”“国”为纲,通过正确教育目的引导,在潜移默化的音乐欣赏中培养稳固的身份认同,进而全面促进大学生人文素养的提高,同时也更加符合教育部在《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中提出的“以美育人、以美化人”要求。

3.1 提高思想认识及价值观塑型

“身份认同”(Identity)理论认为,身份差异与归属,在文化主体性上清晰区分了“我”与“他”的关系,但是,这种在身份上将自己归置于“集体”之中的自我身份确证,存在不稳定性 and 变化的可能,而“认同”的核心,则源自对价值观的判断和取舍。也就是说,人在群体中自我身份的认同,取

决于该群体中是否存在稳定的文化形态,以及这种文化形态可以对个体产生多少影响。每一个体文化身份的自我界定,源自其个人在一个社会群落、一个族群或者一个国家中成员地位的确证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家”“国”承担着个人在价值观、感情等重要精神塑造上的责任。

流行音乐传播对普罗大众的思想及价值观塑型具有重大作用,在流行音乐通识教育的核心要义中,除了包含“博”“雅”的深广之外,实际上对人性更为基础层面的价值观塑型,也提出“教”与“化”的要求。作为一个独特的艺术符号,流行音乐是一种体验与感受的鲜活形态。正如朗格所说:“一件艺术作品就是一种表现性形式,凡是生命活动所具有的一切形式,从简单的感性形式到复杂奥妙的知觉形式和情感形式,都可以在艺术品中表现出来。”^[9]因此,思想及价值观的塑形重点在于,一是将流行音乐的词曲创作和传播领域,改进宏大的“家国叙事”的传统刻板印象,以鲜活的形式一步步融入当代青年的思想塑造过程,让家国情感真正打动青年受众。二是在大学的通识教育体系中,将流行音乐这一重要的大众艺术形式作为必修内容融入教育课程。三是在思政课程中内嵌流行音乐的价值梳理,真正影响和教育大学生群体。

3.2 探索先进的“家国”表达形式

改革开放后,《我的中国心》《龙的传人》《大中国》《爱我中华》《国家》《中国话》等流行歌曲将个体与集体统一,用显在与隐在、张扬与遮蔽相结合的叙事表达策略,为青年受众特别是当代大学生铺陈出表达和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旋律”流行音乐,力图让受众从感官刺激的浅层体验中解脱出来,营造出对“家国”的情感认同,实现了流行音乐承载“家国叙事”新的表达与探索。21世纪以来,伴随着新的技术手段,图像与影像日渐成为普通大众认知大千世界的主要方式。受此影响,青年受众对流行音乐作品的接受与认知也表现出图像化、影像化、娱乐化、狂欢化与消费化的特征,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也出现了或明或暗的偏差。另外,其传播与接受中所呈现的文化多元性,内含价值观念的杂糅性,也非常容易让大学生群体在喜爱与模仿中丢弃中华母体文化的精神内核。文化研究学者陶东风认为:“能够协调社会各阶层的利益、信念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是

能够把人民利益、国家利益和政党利益有机整合在一起的、最有代表性的价值观。”^[10]新的大众文化传播表现形式和表现内容需要重新探索用类似“何惜百死/报家国/忍叹惜/更无语/血泪满眶……我愿守土复开疆,堂堂中国要让四方来贺。”(《精忠报国》)化育的浩然正气来将“家”与“国”建立更为密切的关联和系统输出。因此,对流行音乐通识教育而言,中华文化迫切需要将包含“家国”观念的民族文化融合在新的传播和接受环境变化中,以增进“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3.3 在教育中凸显审美意蕴

大众文化虽然可以被认作一种简单的、为大众接受乃至热爱的文化类型,符合“普通人”的情绪抒发的特质,但是绝不能因此将之视为一种容易沉迷的浅层、毫无教益的娱乐类型。流行音乐也包含了健康的价值取舍、精神塑造,是一个能通过其获得丰富的愉悦性体验的审美过程,正所谓“一代人有一代人之流行音乐”。而美,无疑首先是能让人感觉到愉悦,其价值意蕴在于人们通过感知外在事物,与内心的情感积淀和谐共振后所产生的精神体验。苏珊·朗格说过:“艺术是象征着人类情感的形式之创造。”^[11]因此,在对于流行音乐的审美判断过程中,绝不能简单将其视为“下里巴人”的低级文化。应该看到,新时期以来,社会文化尤其是青年亚文化的嬗变速度在不断加快,这也间接带动了当代流行音乐的创作、传播与接受。影像技术、叙事方式、艺术表达手法迭代的加速,更是让审美体验方式出现了新的变化。“在审美的维度,‘家—国—一体化’叙事往往通过家庭的悲欢离合来寄寓民族/国家的盛衰变迁,进而使观众在情感共鸣和心理认同的过程中接受文本中隐含的意识形态。”^[12]流行音乐的“家国叙事”应该传承这一传统文化内涵,但是也应适应审美体验方式上的新变化而做出相应的表达方式上的调整。如此,才能既保有其巨大的价值意蕴,又在审美中占据一席之地。

4 结语

历史的宏大叙事是由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共同筑成的。中国的音乐教育从生发、演进,到与西方价值观输入杂糅在一起,经历已百年有余,其间数次风潮激荡,既有收获,也留下过深刻教训。而一代人的文化身份塑造,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家

国情怀”作为一个聚合人心、塑造民族文化精神的基石,在一个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性上具有不证自明的作用。

音乐的体裁固然有很多种类,而对于当代大学生,流行音乐是最容易影响青年人情感表达、人格形成和价值判断的大众艺术形式之一。正如梁启超先生说过的,“音乐美术文学这三件法宝,把‘情感秘密’的钥匙都撑住了”^[13]。从更深的角度而言,青年群体价值观念与价值判断的模糊与失范,对新时期意识形态的稳固以及安全具有非常大的冲击,情况严重的,甚至会动摇根基。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更应该见微知著,一个国家如果失去了民族文化与家国认同,就会真正导致“国将不国”的局面出现。而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主体,如果淡漠了“家”与“国”,就不可能有精神上的健全和心理上的安全感、自豪感、独立意识和自我尊重,更不可能维护好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在大学通识教育中充分注意到流行音乐在大学生人格养成以及价值观塑造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并在课程设置和教育实践中贯彻它,以正确的方式引导当代大学生在纷繁复杂且光怪陆离的各种文化现象中明辨是非,不断涵养其对家国和民族文化认同,才是极具意义、更是亟待实践的内容。

参考文献:

- [1] 列文森.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 [2] 孙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繁荣、发展社会主义的音乐事业[J].音乐研究,1989(8):3-4.
- [3] 许纪霖.家国天下[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
- [4] 陈灿.从叙事话语看“家国”身份塑造——以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为例[J].现代视听,2009(12):68-70.
- [5] 肖鹰.九十年代文学:全球化与自我认同[J].文学评论,2000(2):103-111.
- [6] 徐迅.民族、民族国家和民族主义[C]//李世涛.知识分子立场——民族主义与转型期中国的命运.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
- [7] 詹姆斯·克利福特.论人类学的自我形成:康拉德与马林诺夫斯基[C]//张京媛.后殖民理论与文化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8] 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2015-10-14)[2021-11-30].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10/14/c_1116825558.htm.
- [9] 苏珊·朗格.艺术问题[M].滕守尧,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

- [10] 陶东风.核心价值体系与大众文化的有机整合[J].文艺研究,2012(4):5-15.
- [11] 苏珊·朗格.情感与形式[M].南京:南京出版社,2006.
- [12] 彭文祥.论中国影视艺术的“家—国—一体化”叙事[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1):81-86.
- [13] 梁启超.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C]//饮冰室合集(卷三十七).上海:中华书局,2019.

Construction Strategy of “Family and Country Identity” in General Education of College Pop Music

DUAN Bin, HU Hongmei

(School of Humanities, 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 411201, China)

Abstract: Since pop music officially appeared on the stage of Chinese history, as a form of mass culture, it has occupied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general public for more than 100 years, and has also participated in the process of shaping the personality and values of young people. The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growing up with the trend of consumerism are very easy to be wrapped with the dazzling media and means of communication. By combing the “family and country narrative” in Chinese pop music,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crisis of college students’ “family and country identity”, and puts forward the cultivation of their “family and country feelings” and the strategy construction of “family and country identity” by adding pop music education to college general education.

Keywords: pop music; general education; family and country identity; construction strategy

(责任校对 朱春花)